

妻子们的榜样

蔡汝家编

QI
ZI
MEN
DE
BANG
YANG



河南人民出版社



妻子们的榜样

蔡 汝 家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家有好妻，男儿不遭岔事”。没有一个男同志不希望有个好妻子的。

这里选了二十七个好妻子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必将给许多家庭带来福音。夫妻之间，有许多事是相通的。做妻子应该具有的品德，一般也是做丈夫应该具有的。这二十七个好妻子，不仅是妻子们的榜样，也是丈夫们的榜样。男女同志，都应一读。

妻 子 们 的 榜 样

蔡汝家、徐彩霞编

责任编辑 刘连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11.925印张234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190册

统一书号 7105.444 定价1.80元

目

录

战友情深·····	金瑞英 (1)
陈毅元帅的妻子·····	铁竹伟 (19)
李兆麟将军夫人金博文·····	王忠瑜 (45)
吴老和他的夫人游丙莲·····	甘 犁 (62)
在温馨和爱的氛围中·····	柳 明 (70)
真挚的爱情·····	李 伶 (80)
将军的爱情·····	李 伶 (95)
离不开你·····	茹志鹃 (112)
科学家和他的妻子·····	常青 王宗仁 (123)
后妻·····	王宗仁 (142)
飞行员的妻子·····	王培公 (158)
芸芸和她的三男·····	李巨川 张惠明 周鸿度 (168)
妻子的眷恋·····	张跃铭 (191)

啊，妈妈·····	孟宪民 (201)
北京飞来的金凤凰·····	封瑞功 (218)
依依比翼情·····	韩磊 (228)
美与爱之歌·····	张世文 (239)
大运河与他的妻子? ·····	郑思波 (248)
? ——难解的爱之谜·····	吴百孙 (258)
朱伯儒和他的妻子·····	龚培 (268)
普通一兵和他的妻子·····	王颖 (272)
微笑·····	张正隆 (288)
星，在天琴座中微笑·····	张正隆 (304)
恩爱·····	丁楠 (328)
一位教师的妻子·····	曲生 (344)
“街边仔”的贤内助·····	朱荣燊 (356)
有这样一位女性·····	穆倍贤 (363)

金瑞英

——战友情深——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
共同生活片断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画卷上，不仅记载着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而且记载着他们在爱情生活上所表现出的伟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半个多世纪相依相伴，在近六十年的革命风雨中，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恩爱愈笃。他们是真正的革命伴侣，是中国人民生活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这里我们记述的，只不过是他们共同生活中极其细微的片断。

一、在学生运动中相识

象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1919年五四

运动爆发了！京津等地爱国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在樱花盛开的时节，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恩来，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革命激情，带着“国亡无日”的忧愤心情，毅然从日本回国，投入了海河两岸如火如荼的斗争。

那时，领导学生运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急需创办自己的报纸，周恩来被认定为最理想的主编。为了办好《会报》，他日夜操劳。白天，他投入火热的斗争，在反动军警弹压下临危不惧，走上街头演说宣传，参加示威游行；夜晚，他在灯下孜孜不倦写稿编报，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这张《会报》日销两万份，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有较高声誉。

就是在这同一时间里，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的邓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宣传工作。她担任了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部长。她组织讲演队，在市内宣讲厅和公众集会上演说，到偏僻的贫民区挨家挨户宣传。邓颖超擅长鼓动，听她讲演的人常常感动得热泪潏潏。

为了学生爱国运动的需要，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女学生组织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合并，以加强力量，后来又把两个青年学生组织中的领导骨干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领导斗争。

1919年9月16日下午，两个青年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共20个男女青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相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讨论了团体的宗旨和任务，决定办一个白话文刊物，取名《觉悟》。这个团体

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觉悟社”。周恩来和邓颖超同觉悟社的社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座谈，一起研究世界新思潮，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策略和任务。

五四运动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1920年1月29日下午，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率领一千多名示威群众，包围了天津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被查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24名代表。直隶省长曹锐拒绝接见群众，还悍然逮捕了奋不顾身进去说理的周恩来等四名代表。在狱中，周恩来与难友们组织了绝食斗争。他们被押了几个月以后，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找到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说：“他们是代表我们被关押了，我们是来替换他们的，把他们放出去，快把我们关起来吧。”杨以德吓得要死说：“哎，这怎么行呢？诸位先回去，我马上把代表的要求转给省长，绝不延误。”反动当局怕引起更大的“骚动”，被迫放松了对狱中代表们的管制。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直接救援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经过法院审讯手续，不得不于同年7月17日将周恩来及代表们全部释放出狱。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周恩来是一名勇士，是先进青年中极其活跃的杰出的领导人物，邓颖超也是青年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代表，就是这样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为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所连接。

二、急风骤雨中相爱

1920年11月，周恩来和觉悟社的部分社员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去了。他同邓颖超一别将近四年没有见面，但他们鸿雁传书于欧亚两陆，互相传送着战斗的信息。

周恩来把他和蔡和森、赵世炎等在法国的情况，写信告诉邓颖超和觉悟社的同志们，把他们主持出版的刊物《少年》、《赤旗》寄给邓颖超等同志；邓颖超和觉悟社同志们一道，仿周恩来在欧洲出版《觉邮》的办法，把与周恩来等同志的通信，汇编发表在《新民意报》副刊《觉邮》及其它报刊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使远隔千山万水的周恩来与邓颖超紧密相连，感情日深。

1924年秋，周恩来同志按照党的指示，从巴黎回国到达广东，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当邓颖超同志1925年到广州时，周恩来同志虽抽不出时间去接她，还是请陈赓作代表，拿着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到码头去相认。陈赓等来等去也没有认出邓颖超，只得急切返回。没想到，邓颖超同志已经只身找到旅馆，恩来同志知道后赶忙去旅馆看她。

就这样，1925年，在广州一个很简朴的小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久别的战友，终于结成了革命的伴侣。这相逢，这结合，对于革命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将以生死相托，携手勇进，去迎接新的革命风暴。

三、转战南北中相知

1927年3月，春寒料峭。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政治阴云密布，革命的雷电一触即发。3月21日，天气晴朗，阳光融融，中午12点整，工厂和轮船的汽笛齐鸣，歌声、口号声四起，大上海猛然响起了一片铺天盖地的呼喊声。一小时之内，全市八十万产业工人从工厂，从商店，从车站，从轮船，从码头，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到大街小巷，铁路断了，电话不通了，自来水不流了，枪声大作，炮声隆隆，被反动派激起的群众的愤怒，象凌空炸响的惊雷，象横劈暗夜的闪电，摇撼着这里的市区和城镇，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了！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了这次武装起义。

也是在1927年3月21日这一天，在广州，周恩来同志的亲爱的妻子邓颖超，却在经受着一场磨难——他们新婚后的第一个孩子要出生了，但却难产，孩子因难产窒息而不幸夭折了。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当时，邓颖超产后住在医院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陈铁军同志告知她这个紧急情况，她在医生、护士的帮助掩护下，化装出了院。直到5月份，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志才在上海见了面。

可是，5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就又动身到武汉去开展革命工作了。邓颖超同志6月到武汉。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

革命危在旦夕。7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经九江赶赴南昌准备武装起义。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时，仅仅说了到九江去，到九江去干什么，他没讲，邓颖超同志也没问，他们严格地遵守保密制度。就这样，两人又在惊涛恶浪中分手了：一个转战在南昌起义后艰苦奋战的征途中，一个隐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都是蒋汪反革命政权悬赏捉拿的“要犯”。直到这年11月，他们俩才在上海重相见面。那时，邓大姐难产后健康尚未完全恢复。为了革命，他们没有什么安宁的家庭生活；为了革命，他们时常别离；为了革命，他们舍身忘死，健康受到损害。但是，他们没有个人的懊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合，并不是为了寻求安逸。虽然是一对夫妻，可他们自己并不属于对方和自己，而是属于革命，属于党。为革命而离别，他们做到了长相知，不相疑。

四、红岩村里“双乐天”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志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那几年，是非常艰苦的。那时的重庆，党的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是严格分开的。一处是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设在那里；一处是称为“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

在蒋介石发动一次次反共高潮之后，党在重庆的处境日益险恶。红岩村办事处被国民党宪兵、特务和机枪阵地、了望哨所层层包围；而“周公馆”的一幢三层小楼，周恩来、

邓颖超和工作人员只住了一楼和三楼，二楼和收发室的一半则被国民党“要员”等“邻居”占用。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就设在这条小街旁边。从曾家岩到红岩村不过十多华里的马路两旁，除了国民党坐探和“内勤”外，还有不少军统特务。办事处的工作，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皖南事变后，环境更加险恶，斗争十分尖锐。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与红岩共存亡”的战斗口号，大家也随时准备着被捕和牺牲。

在重庆这个群魔乱舞的反革命中心，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泰然自若，巧妙地跟敌人周旋。敌人寄来了装着子弹的恐吓信，他们坚定沉着，毫不介意。他们跟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每月伙食费只有十元钱，每天照例三钱油，五钱盐。有时恩来同志每天只能睡两小时，过度疲劳，消瘦得很厉害。大家担心他的身体，吃饭时给他加一个炒榨菜，他却语重心长地说：八路军在前线卧冰踏雪打敌人，吃的还是窝窝头；我们在后方，没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享受。邓颖超同志虽非常担心恩来同志的健康，可是她从来不为他，更不为自己提出任何一点点非分的要求。

他们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如此水乳交融地一起战斗和生活，给大家增添了勇气。同志们把这办事处的小楼里边，称作国民党统治下的一片小小“解放区”。

当时，在重庆办事处工作的荣高棠和管平夫妇有一个儿子，刚刚三四岁，非常可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很喜欢他。那孩子平时总爱笑，周恩来同志说他是乐天派，后来大伙都叫

他“小乐天”。小乐大跟邓颖超同志感情十分亲密，管她叫作“大乐妈”。周恩来同志把邓大姐唤作“大乐天”。“大乐天”每次到办事处，总是要抱抱小乐天。有一次，邓大姐抱起小乐天正亲热，童小鹏同志抢拍了这个镜头。后来，办事处的墙报上贴着这张照片，下边还写着周恩来同志为它题的一首诗，叫“题双乐天图”。诗曰：“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落款是“赛乐天书”。同志们围着看了又看，都很兴奋。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大约一周去一次红岩村办事处，有时在那里吃饭，时常在饭后，邓大姐对小乐天说：“去，找你‘大乐爸’去玩！”于是，小乐天便爬到周恩来同志身上，搂着抱着，又是说又是闹，一会把“大乐爸”嘴里的牙签拔出来，一会又给“大乐爸”出个什么洋相，逗得“大乐爸”笑得前仰后合。周恩来同志高兴跟孩子玩耍，除了小乐天，方卓芬的孩子，徐克立的孩子，还有其他同志的孩子，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有时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完全忘记了疲劳。邓大姐看这办法还能给恩来同志调剂精神，有时就有意安排这个“节目”。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可真是“双乐天”！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影响下，同志们身居龙潭虎穴，却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欢乐！

五、用左手写的一封家信

1939年夏，在延安，恩来同志去杨家岭中央党校做报告，那天刚下过雨，延河涨水，路途泥泞，将要过河的时候，天已黄昏，由于马受惊，周恩来同志跌了下去，磕在路边的石头上，摔坏了右臂。由于医疗设备简陋，将折骨错位接好，等拆去了石膏之后，右臂已不能伸直。当时延安物质条件极差，党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就医。

那时他虽然右手无法写字，但还坚持工作，组织上派陈舜瑶同志给他当书记员，由他口授，舜瑶代他记录、抄写、整理有关文稿、文件。他出国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有好多材料要送往重庆。于是，他指挥着大家整理东西，将材料装进袋子，请舜瑶代写了给各方面的信。只有一封他没让舜瑶代笔，那就是给邓颖超同志的信。

邓颖超同志知道消息后，打电报给中央，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同志去苏就医，中央考虑到恩来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邓颖超的请求。此时邓颖超同志正在重庆，需要她立即赶回延安。恩来同志十分体贴大姐的心情，怕她着急，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邓大姐收到这封信后，虽然担心，却很镇静，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陪同恩来同志去了苏联。

这封左手写的信，是恩来同志对妻子——同志十分敬重的见证。

六、默 默 的 深 情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那几年，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和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都被接去同他们一起生活。两位老人分别住在房主刘太太家的楼上，同志们都很注意照顾他们。后因日寇大轰炸，两位老人搬到重庆市郊磁器口一个住处暂住。那时在办事处工作的张颖同志因患病也准备同两位老人同住。临走之前，邓大姐特地找张颖，嘱咐说，恩来同志的父亲经历与我母亲不同，过去的生活不象她老人家，应当多照顾点老爷子，常陪他散散步，下下棋，省得他不安心；把他照料得好些，也省得恩来同志分心。而周恩来同志也恰好于行前见到张颖，嘱咐她说，应当多照顾好邓老太太，她是一位革命的老太太，做什么事不愿意别人帮忙，她半夜起来，或是出去倒水，都要多多照料她，乡下路难走，注意她的安全。还说，邓老太太眼睛不好，不要让她多看书，有时间给她念念报纸。

的确，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恩来同志同邓大姐的母亲之间，有着一一种特殊的诚挚的感情。邓老太太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追求进步和光明，以后，她曾随着邓颖超同志到处奔波。在上海，她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住在一起，表面以行医为职业，实则掩护他们作革命工作；在中央苏区，她在红军里当一名医生，为革命战士解除病痛；当周恩来与邓颖超行进在长征的行列时，她在国民党监狱的铁窗内，临危不惧。国民党反动派劝她写信给周恩来与邓颖超，让他们

脱离共产党，她镇静沉着地回答：“儿女之事，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当时，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对于有这样经历的一位老人，周恩来同志对她，除了有一种对长辈的恭敬，更多的是对革命队伍里一个真正同志的敬佩。

也是在重庆，邓老太太病重，邓大姐在身边服侍她。但是，在邓老太太逝世的一瞬间，邓大姐不在身边，邓老太太断断续续地说：你们以后不要管我了。等邓颖超和周恩来赶到跟前，老人已经逝世了。周恩来同志很难过，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站在不住地流泪的邓大姐身边，两个人肩并着肩，站在邓老太太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他们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得落了泪。

难道以生死相托的革命夫妻，还需要用言语去表达自己诚挚的关怀？那默默的深情，不正是最大的安慰！

七、喝一杯欢乐的酒

1943年，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和大部分工作人员离重庆回延安工作。那时同国民党关系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出事，中央决定在重庆只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同志日夜紧张地处理手头的事情。他要安排好同民主人士的联络工作，安排好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要批阅许多重要的文件，忙得几乎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留下的同志为了给周恩来等同志饯行，在那么困苦的物质条件下，

千方百计搞了一点东西，准备了一点点白干，举行了一次会餐。

那天，大家动手把饭菜都准备停当了，同志们围坐在楼下，静等着恩来同志来一道吃这顿暂时的离别饭。邓大姐代表大家上楼去请恩来同志。请了一次，恩来同志没有下来，又请了第二次，他还是没有下来。看着大家都在等着恩来同志，邓大姐又第三次上楼去催。可他实在是太忙了，对大姐的催促，恩来同志没有一点表情，大姐只好下楼来跟同志们耐心地等他。邓大姐知道恩来同志有重要的工作必须抓紧时间完成，不忍心去打搅他，可是对同志们的热情，深感过意不去，心里也是觉着为难。后来，恩来同志下楼来了，对大家久等表示了歉意。同志们异常活跃地向恩来同志和同行的同志们敬酒，恩来同志也向大家敬了第一杯酒。然后，他举起了第二杯酒，走到邓大姐面前说：“我们俩也碰一杯吧！”他怕大姐为刚才的事情不乐意，笑着说：“你还不愉快吗，让我们喝一杯欢乐的酒吧。”他们俩碰了杯，互相对视着，深情地笑了。

八、深夜的电话

有一首诗曾经写道：

“如果世界上真有不知睡觉的人，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
一生睡得最少，最少！”